

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依然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备受关注与瞩目,如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全面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发展。不过,即便是花团锦簇、精彩纷呈,在写作变得大众化、平常化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可喜的是,一批精品力作喷涌而出,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与丰富的艺术内涵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2013年中国文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因阅读范围和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仅对笔者所关注的部分作品进行粗略扫描。

“故乡思维”的文学升华

每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许多作家即便远离故土,生活在异乡,而文学之根却依然深深扎根在自己心灵的故乡。如黄永玉(土家族)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和帕蒂古丽(维吾尔族)的散文集《隐秘的故乡》都生动诠释了故乡的文学魅力。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在1945年就曾动笔写过而没能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分为三部,今年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洋洋洒洒80多万字。一位90岁的老先生,靠什么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料想,这首先需要一种文学精神,一种对文学就像珍爱生命一样的坚守和热爱。无怪乎黄永玉说,“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读过《朱雀城》,我所理解的“故乡思维”不仅仅包括故乡人、故乡事、故乡情、故乡理,还包括故乡的语言、思维、气质和风格等等。

黄永玉的故乡是湘西凤凰,朱雀城也就是凤凰城。《朱雀城》描述了作者12岁前在家乡的生活,但是作者显然不是为了讲故事,不是仅仅叙述一个游子的故乡记忆与成长故事,而是描绘生活,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的湘西,一个饱含文化内涵的、充满人情美与人性美的湘西。小说篇幅巨大,文字却简洁精练,叙述如行云流水、从容淡定,看似随意,实则是匠心独运,字字珠玑。一个个生活细节、一幅幅生活图画、一个人物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朱雀城还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将朱雀城社会各层面的人物都纳入笔端,借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演绎时代风云,将深切的故乡情怀与中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

这个湘西,在沈从文等作家的笔下都有过深刻的艺术呈现。然而,《朱雀城》所描写的众多生活侧面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所承载的深厚的生活内涵与思想情感、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湘西文化特质以及自如从容的叙述、鲜活灵动的口语与独到的人生感悟,都体现出崭新的风貌。可以说,这是关于湘西叙事的一部重要作品,一部厚重的充满民族风格与中华气派的杰作。

帕蒂古丽近两年来脱颖而出,她的故乡大梁坡及其散文写作备受瞩目。生活的苦涩原本冲淡了帕蒂古丽的乡土记忆。离乡多年后才开始回望故乡,是文学给了她勇气和力量让她重新审视故乡,让故乡在她的文学想象、思索与回味中复活,变得真实、生动而深刻。她的文学经历说明,只有具备一定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文学积累,才能让邮票大小的故乡获得文学的升华。

在《隐秘的故乡》中,一个文化混血儿的别样的生命体验、一个由疯母亲和孤独的父亲组建的家庭的苦难记忆,在多元文化杂糅与碰撞下的村庄的世态人情,经过帕蒂古丽细腻的描绘一层层铺展开来。《一堵墙用缝隙说话》《混血的日子》《模仿者的生活》《第六根手指》等等,不仅标题新颖,思想内容也新鲜、独特,然而,帕蒂古丽的散文并不依靠题材的新奇吸引读者,而是通过文化差异背后真切的生命体验感动人,并通过深刻的人生思索与生命感悟震撼人。在散文写作中,一般都会用第一人称叙述,可是帕蒂古丽大多数用的是第二人称。她说:“我用第二人称诉说记忆时感觉很平静,仿佛照镜子,很偷

悦,很自在,很安全。”第二人称叙述拉开了“我”与生活的距离,遥望过往生活的酸楚与疼痛,因距离而变成一种文学的审美,使得回望的笔触变得平静、从容、自然而真切。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与差异性、独特的叙述方式和深刻的思考巧妙交融,造就了帕蒂古丽,使得她的故乡书写成为中国散文写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鲁若迪基(普米族)的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杨启刚(布依族)的诗集《打马跑过高原》,蔡劲松(侗族)的随笔集《云影松风》、龙章辉(侗族)的散文集《好像听见父亲在风中说话》等,也是从故乡启程,思索生活,感悟人生,营造诗意。阮殿文(回族)的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追忆孩童的一往深情,言之切切,感人肺腑。



迸发奔腾的力量

——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亮点扫描 □杨玉梅(侗族)

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度开掘

阿来(藏族)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以瞻对土司部落为中心,准确再现了从清朝、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两百年间康巴地区的传奇历史。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以小说方式展开叙述,对阿来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可阿来不要戏说和虚构,而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为此,他得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辨别真伪,梳理历史,还得调查采访,通过大量真实的细节再现历史。阿来说:“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很多时候,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过于宏观,而文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特别是藏区不安定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本书,我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这部作品通过瞻对两百多年的生存斗争折射整个川藏民族地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状况,对当下现实的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从艺术形式来说,阿来采用了小说的叙事技法:“我”在讲述历史时自如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有史料的展示和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又有作者考察采访的小插曲。历史与现实及作者的感悟融为一体,避免了史料的堆积和阅读的乏味,而增加了可读性与吸引力。它为“非虚构写作”文体从现实延伸到历史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本,也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走出《瞻对》的历史风云,再读丹增(藏族)的小说散文合集《小沙弥》,可以卸下心灵的沉重,而获得精神的慰藉。中篇小说《江贡》生动再现了转世活佛小江贡从一个贫苦的牧童阿措成长为活佛的艰难历程。虽然是虚构,许多细节却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神秘而复杂的修炼成佛的过程,变成真切的抵达圣洁境界的生命体验。虽然充满藏传佛教文化的慈悲情怀和良善思想,却没有深奥的教法与说教之嫌。其他作品均为散文,大多取材于作者的自身经历,饱含博爱之心与普世情怀,又蕴含着深刻的哲思和感悟,在不动声色中传递出宗教信仰

的大善大美,就像一盏明灯,感化心灵,照亮世界。

郭雪波(蒙古族)的长篇小说《天玄机》依然坚持作者一贯的民族题材,但是又有了新的突破,视野更高远,主题思想更深邃。作品以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交错展开故事,一方面叙述上世纪20年代以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伦为主的科考队考察蒙古历史文化的坎坷历程,另一方面描写“我”回到家乡考察民间文化及人类类了几千年的灵魂问题的遭遇。作者采取人类学家的文化视角审视生活,探寻历史与灵魂的秘密,又批驳现实存在的尖锐问题,思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之根,表现出宽广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

阿云嘎(蒙古族)一直以来坚持双语写作,着力于反映蒙古族文化在时代发展变迁中的生存境遇,塑造民族精神。长篇

新作《满巴扎仓》(哈森泽)围绕一部神秘的蒙古药典展开故事,反映了从朝廷、旗贝勒府、寺院到民间的激烈斗争。权力与欲望、忠诚与背叛、圣徒与流氓、情爱与贪欲、侠骨与柔情等等都在作者运筹帷幄的叙述中展示出来,构成了19世纪末鄂尔多斯高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但是小说的要义却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通过各色人物的命运挣扎表现人性的复杂,以历史反观现实,启人深思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问题。

现实观照与艺术超越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唇》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充满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作品。小说叙述了商人艾莎麻利与劲敌哈里的恩怨情仇,大开大合,张弛有力,深刻反映了当下维吾尔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风貌。结仇、复仇而最终化解,善感化恶,这样的故事与主题并不新鲜。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表现人物进行灵动的自我拷问与救赎,获得了对于人生价值、善恶、金钱、欲望、爱情、亲情、友情、信仰、时间等问题的解答与顿悟。比如,艾莎麻利意识到:“一个男人的名声,才是他真正的呼吸器。”“在大地的一切角落,好人和坏人,都逃不出时间的牢笼。”“在一切有光和风雨放肆的地方,好名声都是引路的灯塔。”“钱是双刃剑,它可以让你一个男人山一样地高大,也可以让你一个男人污水一样发臭。”穆医生说:“心地善良了,才能有嘴唇和尊严。”这些深邃的充满智慧的话语,是作者深入思考之后的结果,也是维吾尔族文化的结晶,反映了当下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堪称为新时代的“把人们导向幸福”的《福乐智识》。而且,维吾尔族独特的思维造就了小说新颖的意象和别致的表达,语言机智幽默,给汉语文学带来了质朴与清新之气。

凡一平(壮族)的《上岭村的谋杀》是作者第一部将视野和心灵返回故乡农村的长篇小说。虽然他借用了自己的故乡上岭村作为小说环境,但是故事本身却与自己的乡亲无关,它指

揆霓裳羽衣 探舞学堂奥

——《舞蹈生态学》导论 □朝戈金(蒙古族) 姚慧

在原始社会的文化中,单就表演艺术而言,以我们今天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集语言、音乐、舞蹈、绘画等诸种艺术形式于一体,投射彼时的信仰和观念体系。这些艺术形式之间,又彼此关联,有如唇齿之相依。随着文明的嬗进,原有的艺术混溶性特点被撼动,各艺术门类也渐次获得独立发展,艺术维度的诸多特征逐步得到强化。今天的舞蹈艺术,就是早期艺术诸多思路的发展结果之一。有趣的是,在信息技术急速发展的当下,在国内外又重新看到跨学科理念的某种回归,各学科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研究思路成为更切近地解析研究对象的利器。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理论家资华筠与宁宁合著的著作《舞蹈生态学》,践行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为舞蹈学搭建学科体系,归纳其美学特质,厘清其文化要素,勾勒其生命情态,令人击节称赏。

《舞蹈生态学》不久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是1991年出版的《舞蹈生态学导论》一书的蒸馏和升华。全书6章,分总论、舞蹈的本质与特性、舞蹈形态分析与舞蹈语言系统的构建、舞蹈生态环境的确立与分析、舞蹈生态系统及其作用、舞蹈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披阅之间,觉得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学理思考的前瞻性和前瞻性,表现为如下诸特点:

首先,对新兴交叉学科的拓展与应用。作为舞蹈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资华筠在舞蹈学基础理论建设整体明显滞后于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门类的前提下,虚构舞蹈生态学,“将属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及某些方法,运用于对民族舞蹈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同时吸取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念,探讨舞蹈研究的方法论,创建基础理论,对民族舞蹈生存与发展中的诸多现象进行描写与解释”。这一学术旨趣,就超越了重形式分析而轻内容分析的旧有研究模式,引导舞蹈学界关注舞蹈表情表意的特质,探究舞蹈艺术的核心属性,同时,将舞蹈放置于经济、政治、民俗、礼仪、宗教、生活与劳作方式、民族文化等生态环境中进行剖析,这对舞蹈学科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其次,资华筠坚持立足舞蹈学本体意识,她强调博采众长而不本末倒置,以免最终游离在舞蹈的本质与特性之外。在引入体育、杂技、音乐、戏剧、绘画等相近艺术门类并进行对比中,作者所孜孜矻矻的,仍然是舞蹈之为舞蹈那不可替代的本体,诚如作者所言:“把握舞蹈作为核心物和本体的本体,是吸取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关键,离开了舞蹈本体经验事实生搬硬套,便会造成削足适履,把不同质的现象简单地等同起来,研究浮于表面,效果难以显现,这是研究之大忌。”人文科学诸领域在人类学的影响下,多希冀借人类学之力推动本学科的后式转换。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民族音乐学。其间得失,日后自有公论。不过,在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

论铺垫自己的理论基石方面,《舞蹈生态学》很有心得,体现了作者在理论上的警觉和坚守,殊为不易。

第三,术语体系的构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在提出了“舞蹈生态学”之后,资华筠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宏观的学科概括上,而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用概念术语的建构、研究方法的拓展、舞蹈实践的提炼,为理论框架填充了血肉,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就理论资源而言,作者以亲身舞蹈实践的宝贵经验体验为基底,以长期的学理性思考为纲目,提出舞蹈生态学应在广泛关注文献材料的同时,对舞蹈表演进行实地观测,进而提倡采用量化和统计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定值、定型、定序的分析,以此来确认舞蹈和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资华筠借鉴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技术路线,颇有新意地创立了由“舞动”、“舞畴”、“舞目”、“多维物种”和“舞蹈生态因子”、“生态项”、“生态位”、“生态幅”等一系列概念所组成的舞蹈符号与表述系统。难以系统规避了现有舞蹈批评中用抽象的文学语言难以准确表述舞蹈特性的不足,而且特别应当肯定的是,这看似复杂难解的概念与术语体系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洞的臆造,而是在对古今中外各民族舞蹈的大量实例的整体把握和恰当提炼,并经过深思熟虑,结合舞蹈运动和律动的特性,恰到好处地镶嵌在理论体系中,使概念的阐发有理有据、有血有肉,在舞蹈本体技术分析与诠释的同时,赋予舞蹈深厚的文化意蕴。云南大理白族舞的典型舞蹈语汇、傣族的“蹲抬步”、山东鼓子秧歌中的“场图”、河北的男性道具舞蹈“抬皇杠”、土家族的“茅古斯舞”等,被举重若轻地引来阐释舞蹈的深奥学理,令人无不称赏。在舞蹈学界,有善舞而不善言者,有善言而不善舞者,惟有资华筠这样的舞蹈艺术家和舞蹈学理论家,能够胜任此工作,把舞蹈表演实践拉升到舞蹈理论的层面,再完成对舞蹈学学科格局的整体建构,且游刃有余地转换于实践真知与理论投射之间,有如高妙舞者,动静之间,神形之间,皆有深意,契合无间。

第四,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蹈保护实践前沿问题的关注与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学界目前讨论最多的前沿话题之一,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资华筠,站在舞蹈学学术理论的前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架构舞蹈学学科建设的新方向,可谓极富创造性与实践性。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文化特异性与审美习惯的活化石,作者将一个民族的“自然舞蹈”、“舞体”审美特征与该民族的文化特性差异性产生这种特异性的民族生态环境进行整体观照,使舞蹈生态学的建构蓝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实现了较为完美的交叉与融合。

除此之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与创新性问题的讨论,学界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向的是当下中国的乡村,关注的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命运。多年来,乡村沉重的现实像磐石一样压迫着凡一平,这部作品便之摆脱了“梦魇”。他说:“我写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浑身轻松且愉快。我想我解放了,得救了。我终于有勇气和力量,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

小说里的这场谋杀非同寻常,是好人谋杀恶人的命案,而且是村集体处理一个村霸的案件。坏人韦三得欺男霸女、作恶多端、横行乡里。村民在大学生黄康策的策划组织下成功实施了谋杀,并做出韦三得自杀的现场。然而韦三得被杀,故事只是告一段落,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人报案说韦三得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村支书的大儿子韦波为了村民独自承担了杀人的罪名,一个美好的家庭被摧毁了。最有前途的黄康贤集善良、正义、智慧、学识与爱于一身,是村里的希望,可最后却被韦三得的情妇要挟,被逼上了自杀之路。凡一平是讲故事的矛盾高手,在一个悬念中带领读者走进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然而,小说的深刻还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里包含的乡村伦理道德沦丧、社会秩序紊乱、农村家庭爱的残缺与留守妇女性的扭曲、法律对恶的无能为力等等,这是当下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出现不容忽视的新矛盾、新问题。上岭村的疼痛与深刻是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

周建新(满族)的中篇小说《分裂的村庄》叙述一个村庄的裂变:高速公路将村子分为两半,一部分走向与世隔绝、贫困保守,另一部分走进了现代文明,却因都市垃圾污染源致使多人得病而走向衰败。这个村庄的命运也是当下乡村的一个缩影,启人深思。山哈(畲族)的《追捕》写狱警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和温暖的温暖,令人动容。光盘(瑶族)的《渐行渐远的阳光》关注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穷困潦倒的吕得林患了眼癌却无钱医治,妻子汪小麦被迫离婚,带着病人嫁给家境稍好的二良,小说叙事充满了荒诞色彩,却是残酷的真实。蒙飞(壮族)的《卢长火传》叙述小人物卢长火令人啼笑皆非的生命历程,人物的命运悲剧里隐含着对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王华(仫佬族)的《向日葵》关注的是贫困户的精神生活,启示人们帮扶工作不应该仅仅是物质的扶持,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尊严,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现实还包括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主题。胡冬林(满族)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20年,构建了一个林中写字台。散文集《狐狸的微笑》描绘森林里的青羊、熊、狐狸等生灵的生活习性生命形态,是生态文学写作的重要收获。这样独特的生命写作和文学坚守,也为少数民族作家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的热点还有康巴作家群和内蒙古草原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等。比如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阅读中国 五彩霓裳”丛书推出了叶梅(土家族)的小说集《歌棒》、赵致(满族)的散文集《叙述者说》、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的散文集《远离严寒》、金仁顺(朝鲜族)的小说集《僧侣》、娜夜(满族)的诗集《睡前书》。这些作品文体不一,各具特色,从不同方面代表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最新成就。另外,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在从容的叙述中将生活的苦难、生命的消亡与人性之美、信仰之美和语言艺术之美生动而细腻地表现出来,内涵深厚,意味隽永,是近年来中国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

更有一些充满活力的大学生力量在崛起。如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推出黄土路、陶丽群、周末、潘小楼、梁志松、费城、杨仕芳、何述强、林虹、黄芳等10位作家的新作。还有傣族作家李贵明,哈萨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田榕、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蒙古族作家苏笑嫣,土家族作家田耳、向迅、刘年、朱雷,瑶族作家钟二毛,回族作家马笑泉、于怀军、敏洪涛,达斡尔族作家达拉、晶达等等,均有佳作发表。文学薪火相传,这些锋芒毕露的充满潜质的青年作家是少数民族文学保持勃勃生机的动力,也将成为未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骨子里有乾坤

——读红日长篇小说《述职报告》 □甘应鑫(壮族)

壮族作家红日历经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述职报告》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3年第12期头条推出。这部气韵生动的小说读来显得既严峻又柔和,既忧伤又委婉。从该小说戏谑的语调里,我们依然能读到作者《说事》中的民间智慧、《动弹不得》里的惆怅悲凉。《述职报告》的叙事神定气足、张弛得法、缓急有度,叙述语言虚实相生,道出了时间的流逝和命运的交错,有强烈而深切的命运感。

小说叙述方式别具匠心,巧用民间古老的说话模式,用轻如鹅毛的言语,描述重若千斤的生活。红日在知天命之年,对目睹的生活百态、人间生死,憨态可掬地逐一讲述。这种说话模式,既让人警醒又使人陶醉。小说把官场“险”的一面藏得很深,却又在主人公和平安奈和尴尬的仕途之路上使之显影出来。用说书模式所呈现的审美新质,使小说叙事散发出亲切悠然的气息,凸显出壮族民间语言的风趣和辛辣,同时又升腾起肃穆的悲悯情怀。

说书讲究简明易懂,让读者觉得明白易懂。《述职报告》正是抓住这点,将复杂的故事简明扼要地讲述出来。主人公和平安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遭遇,被叙述得一波三折,让人如坐针毡。玖和平与不良商家斗智斗勇,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官商牵扯的钢丝绳上,或平步青云或万劫不复……这种司空见惯的题材,通过使用说书模式,营造出“烟寒寒水月笼沙”的奇妙情境。

对于玖和平这样的小人物,真正的职责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信仰。他渴望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渴望在诡异多变的仕途上获得成功。他拥有信仰、崇尚民主、禁欲修身,他敢于毛遂自荐,为人化解纠纷。他不依不饶地为人排忧解难,但这却成为他晋升通道上被对手暗杀的导火。由此,一场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暗战上演了。暗战里的道公刘叔,尤如一把梭子穿起整个故事。小说即是以这个民间智慧化身的道公,吊人胃口,试图把读者带回鸡鸣风雨的古老意境。

人生就像一场冒险,投入越多,经受的风险越大。玖和平历经坎坷且尝遍辛酸,其政治生命中少有称心如意事,但面对生活的复杂问题,他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太平;处在艰难困苦中,仍有一种复活的达观和清醒的理智。他母亲身患绝症,身体机能每况愈下,在许多多个夜里痛苦挣扎,无助地望着儿女。玖和平无奈地忍痛接受了母亲的乞求,为母亲注射海洛因(俗称白粉)化解疼痛,陪她一天走向彼岸。因此,玖和平被人举报,遭受牢狱之灾,虽很快走出牢笼,但他却走进了一个没有四壁的铁窗。

死亡,说时漫长,来时猝不及防。玖和平母亲生前养育3个儿子,收养一个弃婴当干女儿。待子女考入大学后,“母亲将她的干女儿,变成了她的儿媳”,这个儿媳妇就是玖和平。别人说母亲封建包办婚姻,母亲却这样对儿子解释:“我可以把雪雁嫁出去,但是,她的父母已经把她抛弃了一次,我再把她嫁出去就等于又把她抛弃了。”“我默默服从母亲的安排……我会从开口说话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对母亲说过一个‘不’字。”朴朴实实的语言昭示出一颗颗纯洁的心灵,反观红日对生死的细腻呈现和对道德传统的遵从,让人觉得惊疑诧异又真实可感。对两人的磨合与冲突的书写,更让人看到生活中的尴尬,人性中的可笑与可怜。母亲彻底解脱了,却把灰暗的背影留在世间。那如泣如诉的描述,让读者夜里都梦见这对母子相聚首。

读过《述职报告》,我们不难发现红日的新姿态——他已从“高海拔地带”走进“负海拔地带”。他调整呼吸抬步向前,以不一样的视角追问人生迷局中的爱与恨、成与败、生与死。于时光之河的漩涡中,他牢牢抓住方言俚语的舟筏,渡过命运的霜冷风干。他突破对权力传统的讽刺,尽一己之力让民间风俗与人物,灼灼地盛开在传统文化枝干上。在《述职报告》里,掺杂着伟大与渺小、可悲与可笑,或许正是这种草根情怀的缘故,让我觉得亲切接地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报告”,红日的《述职报告》就像等待许久的列车陡然而至,载满与生活、生命息息相关的货物,停于时间的站台,等待我们装运。